

## 论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

刘 乐

**摘 要：**身份两难是指自我在三方关系中因对两个互动对象抱持双重认同但却难以同时兼顾两者而陷入的困局。在国际关系的三方政治中，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可能面临其与两端对象之间的关系难以兼容的身份两难。为了妥善应对这一问题，需要理解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具体来说，根据两端外交的内部效果和外部效应，可以将两端外交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三方间两两正和的共赢型、获益于两端交恶的渔利型、受害于两端交好的自作自受型和三方间两两负和的害人害己型。其中，在两端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未改善或缓和的条件下，两端外交的开展方被两面拉拢的左右逢源注定将演变为被两面拉扯的进退两难；随着这种紧张关系的不断加剧，两端对象还会为了避免直接冲突而将第三方作为二者交锋的“棋子”和“战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两端外交的开展方需要克服导致两端对象交恶的渔利短视而对二者关系互动发挥正面作用。作为例证，朴槿惠政府时期的韩国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就分别经历了共赢幻象、渔利冒险、害人害己和自作自受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鉴，国家行为体在开展两端外交的过程中至少应当在两端对象之间做好及时止盈与固本和扮演积极第三方，以求缓解和预防在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身份两难。

**关键词：**身份两难；两端外交；韩国；

**作者简介：**刘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社会关系中，自我并不仅与单一对象进行互动，而是还存在第三乃至多个互动对象。其中，三人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经典的多人关系，亦即三人成众。<sup>①</sup> 据此，我们对于社会互动的讨论可以从两人形态拓展为三人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理解韩国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项目编号：2021YYZX0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战略决策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sup>①</sup> 社会关系具有不同形态。其中，两人形态(dyad)对应的是由两人所组成的任何关系，而三人形态(triad)对应的则是由三人所组成的任何关系。Francis L.K. Hsu, *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 27.

形态。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自我在三方关系中对两个互动对象抱持双重认同,那么就有可能面临难以同时兼顾两者的身份两难(identity dilemma)。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国际互动也不仅仅局限于“两人形态”,进而也就相应地延伸出“三人形态”下的两端外交。也就是说,两端外交可以被理解为在三方关系的整体框架下,其中一方与另外两方所展开的交往互动。<sup>①</sup>相应地,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可能面临其与两端对象之间的关系难以兼容的身份两难。

当前,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夹居其间的相关国家虽然并不愿意在两国之间选边站队,<sup>②</sup>但却日益面临着难以兼顾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的两难局面。<sup>③</sup>因此,有必要理解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从而进一步认识和化解两端外交中的身份两难。据此,本文首先将回顾两端外交的理论和实践,接着在此基础上分析两端外交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然后梳理韩国于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并对其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进行分阶段讨论,<sup>④</sup>最后就应对两端外交中的身份两难得出结论。

---

① 就此而言,行为体开展两端外交的前提和目标是不选边而非选对边,而这也使得两端外交显著地区别于见风使舵。这同时意味着,一旦行为体主动或被动地要在两端对象之间进行二择其一的选边站队,便标志着其对两端外交的放弃或失败。

② 曹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美关系越紧张,其他国家越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74页。

③ Lee Hsien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4, 2020, pp.52-53; Karl Friedhoff, “South Korea Is Staying Out of the U.S. -China Rivalry,” May 5, 2021, *World Politics Review*,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9626/south-korea-is-staying-out-of-the-china-us-competition>.

④ 根据两端外交所涉三方实力的大小对比,可以将国际关系中的两端外交分为三种基本模式:三足鼎立(又分为大三国,例如中美苏,以及小三国,例如新罗百济高句丽)、两大一小(例如中美韩)和两小一大(例如韩日美)。其中,“一小”在两大一小模式中所面临的“两大之间难为小”最为典型地反映了两端外交中的身份两难。据此,本文选择的是对应这一模式的案例。当然,更为精细的划分则将三方按实力进一步分为一超(实力超过其他两方之和)、一大(实力超出其他任何一方但不及其他两方之和)、一中(实力小于一大,大于一小)、一小(实力最小),并由此得出六种类型的三角关系。Theodore Caplow, “A Theory of Coalition in the Tria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1, No.4, 1956, p.491。

## 一、两端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分析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需要先对两端外交的既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目前，学界关于两端外交的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两大方面展开。

### （一）对于两端外交的理论探讨

学界关于两端外交的理论探讨可以分为双重认同、三人关系、战略三角与三角外交、等距离外交与“两面结盟”、中和主义的战略文化以及对冲战略等研究主题。

第一，双重认同。在社会关系中，行为体可以同时兼具两种（乃至多种）身份。其中，内向的双重身份是指自我（I）的两种构成；外向的双重身份则是指他我（me）的两种构成。在此，行为体同时兼具的这两种身份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相容的。就此而言，身份两难描述的是一种行为体陷入难以兼顾自身双重认同的局面。具体来说，内向的身份两难指向的是相互矛盾的自我认同，而外向的身份两难指向的则是相互矛盾的社会认同。与此同时，行为体相互矛盾的认同之间也并非总是在被有效整合的。<sup>①</sup>例如，若泽·洛伦佐-赫尔南德斯（José Lorenzo-Hernández）就指出，在两种认同之间转换的人，可能潜在性地引发两个群体共同的消极反应而不被任何一个群体所承认。<sup>②</sup>换句话说，行为体的双重身份不仅并不必然得到两个投射对象的同时认同，甚至还有可能遭到双重排斥。在国际关系中，两端外交中的双重认同表现为国家希望可以同时与两个互动对象发展并进而不相悖的政治友谊。综合来看，两端外交中双重认同的催生因素可

① 关于矛盾认同的身份整合，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Theory）提出，人们的调和努力可以分为四种认知复杂性依次递增的行为策略：（1）交集（intersection），即行为体将认同投射于能够同时混合多重身份要素的对象身上；（2）主导（dominance），即行为体在多重身份中遴选出一种主导身份，其余的则为从属身份；（3）分割（compartmentalization），即行为体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灵活切换和激活凸显不同的社会身份；（4）兼并（merger），即行为体通过创造一个新的维度从而实现对于不同身份的有效整合。Sonia Roccas and Marilynn B. Brewer,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6, No.2, 2002, pp.90-91; Martin Ehala, *Signs of Identity: The Anatomy of belonging*,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25-27.

② José Lorenzo-Hernández, “How Social Categorization May Inform the Study of Hispanic Immigration,”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20, No.1, 1998, pp.39-59.

以分为历史、国际、国家和个人四个方面：第一，灵活平衡的战略文化；第二，国际体系的战略激励；第三，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共识；第四，领导人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相应地，两端外交中的身份两难在本质上也属于一种对于矛盾认同的身份整合难题。

第二，三人关系。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数量的确定性对于群体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他特别强调了数字“三”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从两人关系到三人关系的转变引起了质的变化。在他看来，第三方在两人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分为三种，并由此构成三种典型的群体形式。<sup>①</sup>其一，中介斡旋。第三方进行中介斡旋的前提是其要么与争端双方的利益完全无涉，要么与争端双方的利益同等相关。具体来说，第三方中介斡旋作用的实现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第三方的存在直接促进或加强了两者的结合，或者经由两者之中的每一方同第三方的关系而建立起他们之间的一种新的、间接的结合；另一种是不偏不倚地居中调解或进行仲裁。在此，第三方可以被视作一个中转站：不管争端的材料由哪方以什么形式递送，中转站都以客观的形式将之转递给另一方，同时将只会激化争端而无益于争端解决的东西截留下来。其二，渔利。它是指第三方以双方已有的争端以及自身与争端各方的关系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于第三方来说，他既可以主动地利用两方争端而两相获益，也可以被动地被争端双方两相争取而获益。反过来，对于争端双方来说，他们既可以因为相互敌对而竞相争取第三方，也可能因为竞相争取第三方而陷入相互敌对。其三，分而治之。它是指第三方故意促成两者不和从而赢得一种自己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具体来说，第三方进行的分而治之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其一，以实力优势阻止或禁止两方之间的联合；其二，以挑拨离间和制造摩擦的方式防止两方之间的联合；其三，以挑起两方之间的正面斗争的方式而彻底消除他们之间进行联合的可能。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三人关系研究为我们理解两端外交开展方在三方关系中的作用类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

第三，战略三角与三角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将一国外交的行为方式分为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双边主义（bilateralism）和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后来，人们认识到多边主义中的广泛性是以牺牲有效性

<sup>①</sup> [德]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1页。

(凝聚力、行动力)为代价的,进而催生了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兴起。<sup>①</sup>在此,国际关系中的数量划分从“单”、“双”跳跃过“三”而直接进入到了“多”。<sup>②</sup>事实上,国际关系中的三方互动亦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行为方式。对此,学界也有所关注和讨论,例如战略三角与三角外交研究。

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将战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理解为一种三方之间的博弈交易。在他看来,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需满足两个条件:战略性(三角之外的其他边角关系居于次要位置)与自主性(因彼此互不受控故得以通过自己与第三方的关系而影响自己与对方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划分价值维度(积极/消极)和均衡维度(对称/不对称)并在两两相互复合后,将战略三角的互动结果进一步划分为三人共处、单位否决、“浪漫三角”和“稳定婚姻”四种理想类型,如表1所示。<sup>③</sup>在此基础上,吴玉山将不同类型战略三角中的实际角色进行了具体划分,并根据角色效益的高低顺序将之排列为枢纽(pivot)、朋友(friend)、伙伴(partner)、侧翼(wing)和弃孤(outcast),如图1所示。<sup>④</sup>进一步地,包宗和基于最大化角色效益的动机驱动,梳理了战略三角中不同角色的动态变化过程,如图2所示。<sup>⑤</sup>

战略三角理论的实践运用之一就是三角外交。冷战期间,中美苏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过一段经典的大三角时期。冷战结束之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逐渐过渡为中美俄新三角关系。<sup>⑥</sup>对此,亨利·基辛格(Henry

①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 1992, p.690.

② 此外,将国际格局的基本形态划分为单极、两极和多极也是一例。

③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1981, pp.485-490.

④ 吴玉山:《抗衡或扈从:从苏联看台湾与大陆间的关系》,正中书局1997年版,第178—183页。之后,吴玉山在两极情境下又将弱权方在与两强构成三角关系中的可能角色进一步划分为伙伴、对冲伙伴(hedging partner)和枢纽。其中,战略三角中的对冲伙伴扮演的是一种在明确倾斜于其中一方的同时仍与另一方进行“勾搭”的角色。Lowell Dittmer, *Taiwan and China: Fitful Embrace*,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200.

⑤ 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42-347页。

⑥ 赵华胜指出,从根本上说,大三角是制衡结构,不是合作关系。合作不是大三角的最终追求,它选择性的合作是基于竞争与博弈的动机和目的。换句话说,通过改善与一国的关系达到对另一国的对话优势是三角外交的要义。赵华胜:《论中俄美新三角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6期,第2、16页。

Kissinger) 提出, 三角外交的有效开展需要因势利导且自然而然。他强调, “在华府、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 我们加强对她们两者的选择, 也就增进了与任何一者互相包容的可能性。”<sup>①</sup> 关于三角外交的实际操作, 他认为, 三角外交必须避免让相互竞争的两端对象形成这样一种印象: 我方是在利用他们其中的一方去对抗另一方, 否则己方就容易陷入被报复和敲诈的境地。<sup>②</sup> 与此同时, 华府还必须让莫斯科和北京都感到满意, 以确保在寻求与对手改善关系的之时, 对手间不会形成共谋。除此之外, 华府还不得不让莫斯科和北京都产生一种怀疑, 即如果他们不与美国合作, 那么美国与他们对手的联合总是一个可以将其替代的选项。<sup>③</sup>

根据上述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 战略三角与两端外交有许多重叠之处, 但是它们之间仍有一些显微的区别: 第一, 战略三角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三角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具体一方置身其中的角色效益, 而两端外交则聚焦三角关系的其中一方的动态处境以及整体的关系均衡; 第二, 战略三角强调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由该国与相关第三国之间的关系所决定, 而两端外交则注重塑造和调适三方关系中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据此, 战略三角中的各方采取的是腾挪倒转、借力打力等方式策略, 而两端外交寻求实现的则是关系导向的关系治理; 第三, 战略三角的互动目的在于借此实现自身战略价值的最大化, 而两端外交的目的则在于争取实现两面交好而非两边交恶, 并因此必须最终实现三方关系的最佳化; 第四, 战略三角中任何一方在其他两方之间的政治倒向将会显著地影响三角关系中的权力格局, 但两端外交却并不必然如此。

第四, 等距离外交与“两面结盟”。阎学通认为, 在两极化趋势或两极格局下, 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在本质上只有两种: 要么在两极中二择其一并与之结盟, 要么在两极之间保持中立(即等距离外交, equidistant diplomacy)。例如, 第三世界在冷战期间的不结盟运动就属于等距离外交。他提出, 不结盟又可以分为两类: 与两极都不结成同盟, 与两极同时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6页。

②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 712.

③ [美]托马斯·格雷厄姆:《中美俄关系与“战略三角”》,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20页。

表 1: 战略三角的基本类型 (I) ①

战略三角	均衡维度	
	对称	不对称
价值维度	积极 (+)	“浪漫三角”
	消极 (-)	“稳定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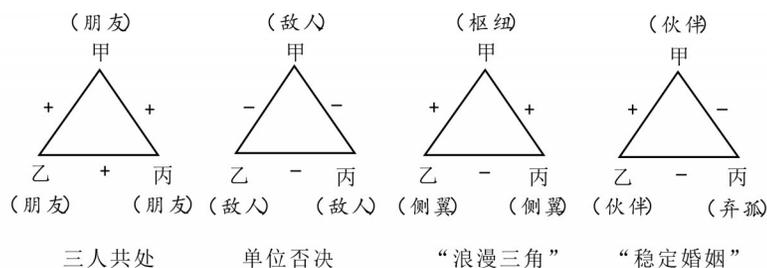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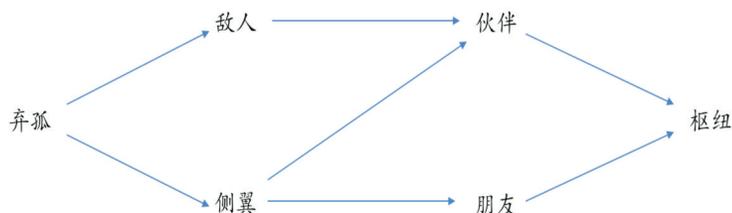


图 1: 战略三角的基本类型 (II)

图 2: 战略三角中的角色转变<sup>②</sup>

结成同盟 (即“两面结盟”)。<sup>③</sup> 曹玮和杨原提出, 小国“两面结盟”的一般原理是: 首先, 小国必须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且仅靠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 而两个大国 (主观或客观上) 只能满足其中一种; 其次, 两个大国之间必须处于一种互有顾忌、彼此均无必胜对方把握的僵持状态。其中, 前者构成小国“两面结盟”的意愿, 后者则为其提供了行动自由。<sup>④</sup> 除了大国之间在

① 此图采用甲方视角, 括号内为其在战略三角中所扮演的角色。

② 资料来源: 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 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第 346 页。

③ 阎学通:《中韩结盟是“时代趋势”》, 载《南方周末》2014 年 10 月 23 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981/>。

④ 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 ——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 载《当代亚太》2015 年第 5 期, 第 49—87 页。

消极意义上的相互僵持，刘若楠认为，大国之间在积极意义上的包容性竞争（inclusive competition）也可以为小国提供充分的战略空间。<sup>①</sup>在此，等距离外交与“两面结盟”可被视作两端外交的一种理想过程和状态。

第五，中和主义的战略文化。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是关于战略偏好及其排序的符号系统，体现的是关于什么是安全难题以及关于如何最优处理（包括首选方式）这些难题的假设。<sup>②</sup>作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国家领导人信念体系的形成并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sup>③</sup>具体来说，受地理、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邻近两强的中小国家在这种隙缝间夹居的国际生存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以中间主义、调和主义、平衡主义等相似外交路线为主要政治表征的中和主义的战略文化，例如自称“两块卵石之间的山药”的尼泊尔所奉行的等近（equiproximity）政策、又如自称“仙人掌中的一个葫芦”的缅甸所奉行的“中间道路主义”等。<sup>④</sup>概括起来，中和主义的战略文化主要指向三个循次递进的战略偏好与战略行为：一是同时与两强友好相处，二是不过分亲近或疏远、依赖或排斥、偏向或背向两强中的任何一方，三是要以在两强之间发挥桥梁纽带等中转与中介作用而获益。在此，中和主义的战略文化可被视作两端外交在单元层面的观念基础。

第六，对冲战略。对冲（hedging）是一个金融学概念，指减低另一项投资风险的投资。<sup>⑤</sup>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冲被界定为合作程度大于接触、

---

① 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9-71页。此外，与包容性竞争相似的理论概念还有大国共治、双重领导、竞争性共存、建设性并立等。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42-43页；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22-25页；顾炜：《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136-138页；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n: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2018, pp. 125-126; 张弛：《建设性并立：构建美韩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互动的新模式》，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6期，第134-136页。

② [加拿大]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郭树勇校，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3页。

③ 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6页。

④ [尼泊尔]如博·萨普科塔：《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主义：超越地缘政治的倡议》，赵雪丹译，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第76页；彭念：《东南亚国家对华对冲战略——缅甸是个例外？》，载《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150-151页。

⑤ 王福重：《金融的解释》，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小于绥靖，且对抗程度大于约束、小于防范的一种行为。<sup>①</sup>相应地，对冲战略指向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策略组合。<sup>②</sup>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对冲战略是指国家避免（或因应）无法在制衡、追随或中立等替代选项中进行决断时所选择的策略组合。借此中间立场（middle position），国家得以预阻或避免因被迫选边站队而不得不去承受相应代价。<sup>③</sup>帕萃西娅·魏茨曼（Patricia A. Weitsman）也认为，对冲国在面临低水平威胁时，会与潜在的敌手和朋友保持低水平的承诺关系，从而避免由于在两者之间二择其一而触怒敌手或离心朋友。<sup>④</sup>周方银则认为，对冲战略主要是通过一组相互对立的政策选择，抵消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从而为行为体的长期利益起到保险作用：既为有利的情况留下空间，也为不利情况的发生做足准备。<sup>⑤</sup>在此，对冲国在不同议题上所持有的无论是中间立场还是相反立场，都旨在以此策略组合实现避险增益。<sup>⑥</sup>例如，郭清水（Cheng-Chwee Kuik）就指出，中小国家对于崛起大国的对冲战略旨在平衡兼顾回报最大化与因应风险不测的政策选项。<sup>⑦</sup>在对于对冲的类型划分上，王栋根据威胁认知（threat perception）和相对能力（relative capability）的高低，对对冲战略的行为强度和政策形态进行了具体讨论。其中，威胁认知影响了国家进行对冲时的行为强度，相对能力则决定了国家选择对冲战略时所能够运用的战略资源以及可能的战略工具组合。此外，他还按照对冲战略的对象数量，将对冲划分为单一对冲（singular hedging）、双重对冲（double hedging）和多重或复合对冲（multiple/

① 就此而言，如果对抗性上升到制衡，或者合作性上升到追随，那么对冲就不复存在。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9页。

②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 165.

③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Policy Studies 16),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5, p. viii.

④ Patricia A. Weitsman, “Alliance Cohesion and Coalition Warfare: The Central Powers and Triple Enten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3, 2003, p. 82.

⑤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5页。

⑥ 就此而言，行为体进行对冲的动机不仅包括规避安全风险和应对安全威胁，而且涵盖降低政治成本和提高物质收益。Darren J Lim and Rohan Mukherjee, “Hedging in South Asia: Balanc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amid Sino-Indian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9, Issue 3, 2019, pp. 493-494.

⑦ Cheng-Chwee Kuik,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Issue 4, 2013, pp. 435-436.

complex hedging)。<sup>①</sup>在此，双重对冲可被视为两端外交中的一种行为选择。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两端外交的理论探索主要散落和嵌入于不同学科涉三方互动的既有研究中。以前导研究为理论基础，本文将进一步提出关于两端外交的理论框架，并对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进行理论阐释。

## （二）两端外交的亚太实践

中国崛起使国际社会无法回避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日益增加的复合影响力。由此，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中美两国已经成为能够共同影响相关国家战略利益的两大核心力量。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跳出从简单的两组双边关系加和的角度对待其与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战略思维定势，而更多地在三方关系的整体框架下对之进行审视和权衡。其中，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他们大都希望在不背离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能够与中国发展更高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sup>②</sup>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以与中美两国建立和维持并行不悖的政治友谊也同样重要。换句话说，在现阶段中美权力转移和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相关国家的战略行为和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确保自身能够在二者之间至少不左右为难以及最好能左右逢源，因而大多都在极力避免中美之间的矛盾激化和冲突失控（虽然也有一些国家在中美间煽风点火并以此饮鸩止渴），<sup>③</sup>从而导

<sup>①</sup>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34-36页。

<sup>②</sup> 当然，既是美国联盟体系一员又在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之中的重合国家对于二者关系的处理并非没有差别。对此，周亦奇就将之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对抗型（例如日本）、较易共存型（例如英国）和较难共存型。其中，最后一种又可以细分为三种具体形式：地理距离驱动的（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利益驱动的（例如朴槿惠政府前期的韩国）和领导人驱动的（例如杜特尔特政府时期的菲律宾）。Zhou Yiqi, "China's Partnership Network Versus the U.S. Alliance System: Coexistence or Conflict?"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3, No. 1, 2017, pp. 7-12.

<sup>③</sup> 虽然中美已经进入长期战略竞争，但是鉴于两国之间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双方仍然可以构建一个新的战略框架以进行良性竞争。左希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204页。从消极角度来说，避免掉入第三方陷阱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内容；从积极角度来说，能够使第三方在中美之间自在容身也是中美良性竞争的题中之义。反过来看，中美良性竞争文化的形成不仅需要中国以及中美的积极努力，也应由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塑造。就此而言，中美之于第三方的良性竞争与第三方之于中美的良性作用互为镜照。其中，对于第三方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而言，中美良性竞争文化的内涵在积极意义上应是培育中美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在消极意义上应是不逼迫第三方在中美间选边站。事实上，中美两国已分别就此作过呼吁和表态。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7日；The U.S. Mission 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affirming and Reimagining America's Alliances: Speech by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following NATO Foreign Ministerial," March 24, 2021, Brussels, Belgium, <https://nato.usmission.gov/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alliances-speech-by-secretary-of-state-blinken-following-nato-foreign-ministerial/>.

致被迫要在两国之间选边站队的情况出现。<sup>①</sup>

第一，韩国。对于韩国来说，韩美同盟与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其外交战略中都享有重要地位。在安全上，肇始于1953年10月的韩美同盟被韩国视为其外交安全的基轴，同时韩国在朝核问题、半岛统一等安全议题上也对中国有着现实的安全期待；在经济上，中美两国同为韩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因此，在韩美同盟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韩国对于同时交好中美有着现实的战略需求。与之相应，韩国制定和执行的是在中美两国之间既不联美制华也不亲华疏美，而是协和与并举韩美同盟与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外交路线。<sup>②</sup>换句话说，韩国在加入美国联盟体系的同时，也容受了中国及其崛起。<sup>③</sup>不仅如此，韩国还进一步地将自身定位为沟通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的桥梁国家（교량국）。<sup>④</sup>对此，石源华和李宁将之称为平衡外交的“韩国模式”，并将其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不选边站队、<sup>⑤</sup>充分利用中美两国各自对于韩国国家利益的比较优势、对于韩中、韩美关系中的问题进行预防性沟通、注重发展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sup>⑥</sup>

第二，澳大利亚。1951年9月，澳大利亚与美国签订安全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同盟关系。自此，澳美同盟始终是澳大利亚安全政策和战略稳定的基石，而这也是澳大利亚任何一届政府的基本共识，并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不可撼动的关键部分。<sup>⑦</sup>与之相伴，澳大利亚基于自身的地缘

① 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31, No. 1, 2016, p. 11.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Korea, Diplomatic White Paper 2015, December, 2015, pp. 27-28, [http://down.mofa.go.kr/eng/brd/m\\_5684/down.do? brd\\_id=761&seq=315981&data\\_tp=A&file\\_seq=2](http://down.mofa.go.kr/eng/brd/m_5684/down.do? brd_id=761&seq=315981&data_tp=A&file_seq=2).

③ 康灿雄 (David C. Kang) 提出，在追随战略和制衡战略之间还存在诸多中间战略。其中，根据对于目标国家恐惧程度的高低强弱，可以将之分为容受战略 (accommodation) 和对冲战略。David C. Kang,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9, No.1, 2009, p.3.

④ 詹德斌：《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载《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第23页。

⑤ 2021年3月18日，韩国外长郑义溶 (정 의 용) 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强调，让韩国在中美之间选择任何一方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韩外长：中美都重要不可二选一》，韩联社中文网，2021年3月18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318007100881? section=search>。

⑥ 石源华、李宁：《告别“非此即彼”：韩国模式的亚太意义》，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0期，第39页。

⑦ [澳] 马必胜：《澳大利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许少民译，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68页。

位置也在日益拓展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在巩固澳美同盟的同时坚持“融入亚洲”的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保罗·基廷政府（Paul J. Keating administration）就提出“亚洲唯一”的外交政策。之后，约翰·霍华德政府（John W. Howard administration）将之调整为“亚洲第一”政策。近年来，在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澳大利亚对华则采取的是“接纳+软制衡”的外交政策，即在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并对中国的安全诉求给予更好理解的同时，与其他国家一道寻求将中国纳入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之中。<sup>①</sup> 例如，2017年11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在其发布的外交白皮书中就强调，美国和中国同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际伙伴，澳大利亚一方面高度肯定澳美关系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将致力于推进和强化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sup>②</sup> 总体来看，澳大利亚寻求的是在对中美两国的两端外交中实现对于澳美关系与澳中关系的平衡兼顾和均衡发展。

第三，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区域，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面对崛起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心态不一。陈庆鸿提出，菲律宾的对华战略选择（追随、制衡或对冲）是其对华经济预期和威胁感知复合作用的结果。<sup>③</sup> 温尧提出，东南亚国家在对华对冲战略中糅合了经济接触、制度羁绊和间接制衡三种主要手段来取得收益和消解风险，以此来应对中国崛起所伴随的不确定性。<sup>④</sup> 面对美国霸权，东南亚国家同样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于美国的安全保障具有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角力的主战场，特别是担心自身会沦为美国对华遏制的棋

---

① 王联合：《战略两难与利益均沾：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澳大利亚亚太战略解析》，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4期，第109页。周方银认为，澳中关系晚近的紧张和曲折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对于崛起中国将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误读和错解，其根源在于澳方对于一些微弱信号进行过度解读后所出现的方向性偏差。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第58-59页。

② Australian Government, Opportunity, Security, Strength: The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November 23, 2017, pp. 38-40, <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chapter-three-stable-and-prosperous-indo-pacific/united-states-and-china>.

③ 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145页。

④ 温尧：《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第14-22页。

子。<sup>①</sup> 由此，面对中国崛起、大国竞争以及东盟地位的弱化、分化和边缘化等地区风险，东南亚国家逐渐形成了基于风险抵消（通过双多边方式进行多维度的有限制衡，以降低地区风险演化成地区威胁之时的破坏能力）和风险转化（借助地区多边机制网络以规范地区行为体，以降低地区风险演化成地区威胁的可能性并提升自身的抗御能力）两套逻辑的对冲战略。<sup>②</sup> 此外，张伟玉和王丽认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因为伴随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美国国家信誉的下降，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都难以形成绝对优势，因而东南亚国家担心自身追随的国家在大国竞争成功后因国际信誉差而将其抛弃，或因国家实力不敌对手而在大国竞争失败后导致其受到牵连和惩罚。<sup>③</sup> 综合来看，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是希望可以实现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并以此两面获益。相应地，东南亚国家对于中美两国事实上奉行的是一种双轨的、齐头并进的交好政策，而避免完全追随或制衡中美两国之中的任何一方。<sup>④</sup>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还高度重视并积极借助东盟平台在中美之间担当诚实的中间人（honest broker），<sup>⑤</sup> 以缓解大国战略竞争对于自身外交空间和中心地位的挤压和削弱。

总体来看，与美苏两国在平行体系下的两极格局不同，中美两国的两极化进程更多的是在彼此互嵌的国际体系中进行的。相应地，无论是在安全—经济分离的二元格局还是发展到安全—经济复合的二元格局，其他国

① 例如，美国国内有一种声音就认为，东南亚地区是美国通过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来应对中国政治推广的关键区域。Patrick M. Cronin et al., *Contested Spaces: A Renewed Approach to Southeast Asia*, March 2019, Centre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p.22,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CNAS+Report\\_Contested+Spaces\\_Asia\\_Final+\(2\).pdf](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CNAS+Report_Contested+Spaces_Asia_Final+(2).pdf).

②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85—86页。

③ 她们提出，较强的国家实力和较好的国际信誉是大国吸引中小国家追随的必要条件。张伟玉、王丽：《国际信誉、国家实力与东南亚战略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92页。

④ Van Jackson,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 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4, Issue 3, 2014, p. 335.

⑤ ASEAN,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June 23, 2019, p.1, [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诚实的中间人在这里的潜台词是，其他国家同东盟和东盟国家的合作要基于促进互利共赢，而不是让东盟选边站。换句话说，在选边站队的问题上，东盟和东盟国家既不会作选择，更不愿作选择。2021年7月7日在北京的访谈。

家基本都有比较充分的意愿与中美两国同时保持较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往来，而这也显著地区别于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的壁垒分明。正如阎学通所指出的，区别于冷战时期，中美两极格局下的国际秩序将由一种灵活的议题联盟而非基于意识形态划界而形成的对立集团所塑造。<sup>①</sup>由此，原先零和、排他、互斥的安全盟友可以随之转换为非零和、共享、相容的政治盟友。<sup>②</sup>正因如此，中小国家目前既希望也需要在中美之间守中持平而保证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理解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以求缓解和预防相关国家在开展两端外交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身份两难。

## 二、两端外交的基本类型与行为逻辑

为了解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本文将先根据两端外交的内部效果和外部效应而对其进行类型划分，接着讨论每种类型的两端外交背后的行为逻辑。

### （一）两端外交的基本类型

两端外交的开展方与对象方在三方互动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战略反馈各不相同。据此，可以将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划分为内部效果与外部效应两大方面。其中，前者指向两端外交的内部作用方，即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在其两端外交对象之间的处境；后者指向两端外交的外部作用方，即两端外交的对象方彼此之间的关系。

#### 1. 两端外交的内部效果

根据行为体是否得以在与两端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同时发展并行友谊，可以将两端外交的内部效果划分为两面讨巧的左右逢源和两边开罪的进退两难。

---

<sup>①</sup> Yan Xuotong, "The Age of Uneasy Peace: Chinese Power in a Divided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1, 2019, p. 46.

<sup>②</sup> 例如泰国和韩国之于中美。阎学通：《历史的惯性》，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199页。当然，“脚踏两只船”（同时加入中国和美国各自领导的不同议题联盟）将被两个大国视为没那么可靠的伙伴；同时，联盟成员也可能因为其在一边联盟的要求下采取的行动而遭到来自同属的另一边联盟成员的惩罚。Yan Xuotong, "Becoming Strong: The New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4, 2021, pp. 46-47.

第一，左右逢源。左右逢源谓之“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指处于左右通达并及取益的良好局面。在社会互动中，左右逢源意指行为体处于一种两相兼顾、两面交好的关系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体受到三方关系中其他两方的共同示好，且其中任何一方的积极争取都会促使另一方更加主动的争取，从而得以与之并行交好。无疑，这需要行为体本身具有相当的战略价值和政治手腕。

第二，进退两难。进退两难又称进退维谷，是指陷入前无可进、后无可退的两难境地。在社会互动中，进退两难意指行为体处于一种顾此失彼、左支右绌的关系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体在三方关系中与其他两方中的任何一方的积极关系以及关系增进都会为另一方所不满并将之视为背叛，从而使行为体难以在两者之间从容自处。

## 2. 两端外交的外部效应

根据行为体在与两端对象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事实作用，可以将两端外交的外部效应划分为作为正面效应的关系优化和作为负面效应的关系恶化。

第一，正面效应。两端外交的正面效应是指两端外交造成目标对象之间关系的改善和优化。其中，对于两端外交的开展方来说，这种正面效应的反身影响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推动目标对象的关系缓和并以此获益；其二，促进目标对象的关系缓和却因此受损。

第二，负面效应。两端外交的负面效应是指两端外交造成目标对象之间关系的倒退和恶化。其中，对于两端外交的开展方来说，这种负面效应的反身影响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制造目标对象的关系紧张并以此获益；其二，引起目标对象的关系紧张亦因此受损。

由此，根据两端外交内部效果与外部效应的复合作用，可以将两端外交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共赢型、渔利型、自作自受型和害人害己型（如表2所示）。

表2：两端外交的基本类型

两端外交		外部效应	
		正面效应	负面效应
内部效果	左右逢源	共赢型	渔利型
	进退两难	自作自受型	害人害己型

## （二）两端外交的行为逻辑

如前所述，两端外交存在四种基本类型。接下来，笔者将具体分析每种类型的两端外交背后的行为逻辑。

第一，共赢型。这种类型的两端外交是指两端外交的开展方不仅得以实现与两个目标对象同时交好的左右逢源，同时两个目标对象之间也借此保持着彼此交好的相互关系。在此，由于其中的三者两两之间都保持着正向关系，因而这种两端外交无疑是共赢的。根据两端外交开展方战略能力的高低不同，两端外交正面效应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由于两端外交开展方的往来穿梭（shuttle）与说和促好，从而推动两端对象之间的关系改善。这种情况要求两端外交的开展方既具有较高的战略实力和关系资本，又能够进行有效的战略沟通和外交调解；其二，由于两端外交的开展方的政治运作和两面争取，从而促进两端对象在与己的三方关系中达成默契甚或友好共识。这种情况并不要求两端外交的开展方能够彻底改善两端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只要不卷入他们之间的针锋相对或者是能够缓解他们在涉己互动中的矛盾冲突即可两不开罪，从而实现三方关系在这一特定框架中的关系优化。需要认识到的是，虽然共赢型两端外交对于三方整体来说是最优的关系结构，但是对于两端外交的开展方来说，这种类型的两端外交需要持久地投注大量的政治成本，因而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往往难以抵御短线利多的渔利诱惑。

第二，渔利型。这种类型的两端外交是指两端外交的开展方虽然得以实现其与两个目标对象同时交好的左右逢源，但却是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为风险和代价的。正因如此，这种两端外交可以被视为一种东食西宿的两面渔利。在此，虽然两端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促使任何一方都寻求对于第三方的战略争取，从而拉抬和提升第三方的战略价值，进而使得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在短期内处于被两面拉拢的左右逢源状态。但是，这种情势将会随着两端对象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而变得难以为继。这是由于这种情况下两端外交的开展方与两端对象任何一方的关系发展都将压缩其与另外一方的关系空间。经此不断的双向拉扯和相互压缩，两端外交的开展方也将因外交弹性趋于极限而日益面临进退两难的棘手局面，从而最终导致其在两端对象之间无利可渔：要么被两端对象的其中一方或双方共同抛弃甚至是遭到战略报复，要么主动选择战略倒向而使得原先的两端外交

彻底崩溃。因此，渔利型两端外交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终将面临甚至它本身也在加速选边站队局面的最终到来，因而注定难以长久。

第三，自作自受型。这种类型的两端外交是指两端外交的开展方虽然处于无法实现与两个目标对象同时交好的进退两难，但却在事实上促进了两端对象之间的关系改善。在此，由于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在这其中两不讨好却使两端对象从中得益，因而这种两端外交无疑是自作自受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两端对象为了避免直接冲突而经由第三方的缓冲地带而进行角力，或者索性将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转嫁到各自与第三方的关系之中。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两端外交虽然在客观上有助于两端对象之间的关系缓和，但却与两端外交开展方的战略利益严重向背，因而必然会促使其迫切寻求改变这一不利处境。

第四，害人害己型。这种类型的两端外交是指两端外交的开展方不仅自身处于无法实现与两个目标对象同时交好的进退两难，而且还导致两端对象之间的关系恶化。正因如此，这种类型的两端外交无疑是害人害己的。究其原因，在于两端对象之间不仅难以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还因自身两端外交的开展而激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由于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又在两端对象之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而自身也被累及遑论居中缓颊以及从中两全。由于其中三者两两之间都保持着负向关系，因而任何一方都未能在这一结果中获益，所以三者都会产生寻求脱离这一困境的现实需要。

为了对上述理论发现加以检验，笔者将在下一节系统梳理韩国于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并对其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进行分阶段的讨论。

### 三、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2013年2月-2017年11月)

随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日益加剧，亚太国家开始产生在中美之间开展两端外交的现实需求，其中又以朴槿惠政府上台后的韩国最为典型。由此，韩国外交开始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亲美疏中”调整为“美中并举”。据此，本文将以朴槿惠政府时期的韩国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为研究对象来进行案例分析。

在具体时间节点的选择上,本文截取的是从朴槿惠政府上台(2013年2月)到文在寅政府完成对于中韩关系的修复(2017年11月)的这段时间。在这一时期,韩国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高开低走,并经历了循环演变的五个发展阶段。特别地,这一时期的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而戏剧性地从“历史最好时期”<sup>①</sup>几近跌至冰点。因此,笔者选取这一案例来检验本文关于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的理论发现。

### (一) 三方共赢的幻象(2013年2月—2014年7月)

2012年12月29日,韩国新世界党候选人朴槿惠(박근혜)以51.55%的得票率当选第18届韩国总统。在候任总统期间,朴槿惠首先向中国派遣了由金武星(김부성)率领的特使团,体现了其对韩中关系的高度重视。之后,朴槿惠也向美国派遣了由李汉久(이한구)率领的政策协商代表团,并在访问首尔龙山(용산)韩美联合司令部时强调韩美两国是“血盟”关系。<sup>②</sup>不难看出,朴槿惠在赴任之前就已经在酝酿施行韩美同盟与韩中战略伙伴关系并行发展的外交政策。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宣誓就任韩国总统,标志着朴槿惠政府的正式上台。之后,朴槿惠政府与美国和中国分别进行了巩固双边关系与争取两相交好的外交努力。

对于韩美关系,朴槿惠政府上台后积极寻求与美国继续巩固韩美同盟关系。2013年5月5日至10日,朴槿惠赴美进行了为期6天的工作访问,这也是她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5月7日,韩美两国元首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纪念韩美结盟60周年联合宣言》(以下简称《韩美联合宣言》)。《韩美联合宣言》指出,如今韩美同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合作,而是扩展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全面战略同盟(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并正在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sup>③</sup>2014年4月25日至26日,美

① 《中国外长王毅:中韩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7/6218508.shtml。

② 《朴槿惠强调韩美两国是“血盟”关系》,韩联社中文网,2013年2月22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30222001500881。

③ The White House, Joint Declara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8,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5/07/joint-declaration-commemoration-60th-anniversary-alliance-between-republ.此外,韩美两国在《韩美联合宣言》中还强调,双方将继续强化韩美同盟全面、具有操作性的联合防卫能力。

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H. Obama)应邀赴韩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4月25日,韩美两国元首在青瓦台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了两国坚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sup>①</sup>

对于韩中关系,朴槿惠政府上台后则积极寻求与中国充实韩中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4月24日,韩国外长官尹炳世(윤병세)同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商定开通两国外长热线以加强战略沟通。<sup>②</sup>2013年6月27日至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应邀来华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6月27日,韩中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两国一致同意进一步推进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决定今后共同大力发展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sup>③</sup>会谈期间,习近平称赞朴槿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sup>④</sup>此外,朴槿惠在此次访华期间还受到了中方举办高规格欢迎晚宴,以及次日连续举办欢迎午宴的特别礼遇。可以说,朴槿惠政府通过此次访华基本实现了巩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总体目标,同时推介了自身“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外交政策,<sup>⑤</sup>并进一步促进了双方在战略沟通、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2014年3月23日,习近平同朴槿惠在荷兰海牙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相互感谢了中国在哈尔滨建立安重根纪念馆以及韩国归还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等相关工作,并

① 《韩美首脑会谈确认韩美同盟坚固而紧密》,韩联社中文网,2014年4月25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40425003400881>。

② 《韩中商定开通外长热线加强战略性沟通》,韩联社中文网,2013年4月24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30424004700881>。

③ 《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13年6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053915.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053915.shtml);《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中国新闻网,2013年6月28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3/06-28/4978869.shtml>。

④ 《习近平与朴槿惠举行会谈》,新华网,2013年6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27/c\\_11631903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27/c_116319037.htm)。

⑤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主张韩国以坚固的安保为基础,在拥有足够威慑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韩朝互信,发展韩朝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和平,进而为统一打下基础。“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又称“首尔进程”)主张六方会谈的与会国以“赫尔辛基进程”作为蓝本,首先从气候变化、反恐和核能安全等非政治领域议题进行对话,逐渐增进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信任,从而缓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关系。根据《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中方对前者表示欢迎,对后者予以赞赏和原则支持。

赞扬它们已经成为连接两国友谊的纽带。<sup>①</sup> 2014年7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韩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专程出访一个国家。7月3日下午,朴槿惠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并在会谈结束后共同发表了《中韩联合声明》。双方商定,中韩为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并将共同推进在政治安全、互利合作和人文交流领域的主要工作。<sup>②</sup>

总的来看,朴槿惠政府在上台初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对于韩美关系和韩中关系的平行推进:一方面,韩美同盟得以进一步巩固,两国合作拓展至多个领域和多个层次;另一方面,韩中战略伙伴关系也得以稳步发展,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均表示韩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sup>③</sup>与此同时,韩国希望借助其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以推动半岛无核化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外交政策也基本得到了中美两国的欢迎和认可。

但不容忽视的是,韩国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还面临着激化中美战略矛盾和加剧中美战略竞争的潜在隐忧。据相关报道,韩中两国元首早在2014年7月举行的会谈中就围绕美国考虑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即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问题进行了商讨。<sup>④</sup>据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在席间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并呼吁韩方慎重处理与美国的反导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国声称其与韩日等盟国力促在东亚地区构建导弹防御系统绝不是以对抗中国为目标,但中方很难不将其视为美国包围中国战略的一环,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sup>⑤</sup>

---

① 《韩中首脑荷兰会晤商讨朝核问题》,韩联社中文网,2014年3月24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4032400030088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联合声明》,新华网,2014年7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03/c\\_111144961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03/c_1111449615.htm)。

③ 《韩中首脑举行会谈韩方望中方说服朝鲜搞经济建设》,韩联社中文网,2013年10月7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31007001200881>;《朴槿惠:韩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密切》,韩联社中文网,2014年1月6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40106002400881>。

④ 《习近平抵韩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韩联社中文网,2014年7月3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40703001200881>。

⑤ 《习近平访韩时曾呼吁韩方慎重对待与美反导合作》,韩联社中文网,2014年8月26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40826000700881>。

与此同时，虽然韩方致力于独立研发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Korea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KAMD），<sup>①</sup>但美国一直坚称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与“萨德”系统应具有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sup>②</sup>

由此，中国倾向于将韩美反导合作问题当作考验中韩关系的试金石。同时，韩国在与美国的反导合作以及安全合作方面的回旋空间非常有限。就此而言，韩国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所期待的三方共赢愿景不过只是某种幻象。

## （二）两面渔利的冒险（2014年7月-2016年6月）

对于韩国来说，其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既有催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外部效应，也有变向提升自身战略价值，进而引起中美竞相对其进行战略争取的内部效果。因此，在无力扭转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背景下，韩国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两端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两面渔利的冒险：借助中美两国对于韩国的战略争取，以增进韩中关系的方式来抵消增进韩美关系而对韩中关系所造成的冲击，同时又以增进韩美关系的方式来抵消增进韩中关系而对韩美关系所造成的冲击。

首先，韩国通过暧昧推进“萨德”系统入韩以缓解美国对于韩中热络的疑心。对于“萨德”系统入韩，韩国一方面不得不顾及韩美同盟始终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基轴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韩国一直以来也在顾虑和顾忌中国对此问题的坚决反对，因而韩国关于这一问题保持的是暧昧推进的态度。这种暧昧态度在韩国两面渔利的冒险中又分为从不置可否到逐步试探的发展过程。

第一，不置可否（2015年2月-2016年1月）。2015年2月4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한민구）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首尔举行了韩中防长会谈。会谈期间，常万全就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的可能性表示忧虑，并阐明了中方对此问题的反对立场，而这也是中国国防部高层官员首次向韩方表明对于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对此，韩

① 2013年10月16日，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김관진）在国防部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韩国将坚持发展本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强调韩国不会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Missile Defense, MD）。《韩防长紧急否认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环球网，2013年10月17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CHkc>。

② Lee Dong-jun, “Seoul Treads Tricky Line Around U.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eeds,” Global Times, October 13, 2013,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817469.shtml>.

民求表示,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也没有向韩方提出相关要求,韩美之间并未就此进行协商。<sup>①</sup>2015年2月11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F. Kirby)在记者会上表示,美韩正在就在韩部署“萨德”系统进行持续讨论。<sup>②</sup>同天,韩民求在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就美国考虑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表示,出于战略性考虑,韩国国防部在此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很有必要。<sup>③</sup>2015年2月25日,韩民求在出席国会质询政府有关政治、外交、安全工作大会时就此问题再次表示,美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请求,韩美双方未就此问题进行过协商,韩国也没有引进“萨德”系统的计划。他进一步强调,“引进”意为购买。也就是说,韩国政府没有“购买”“萨德”系统的计划。同时,对于驻韩美军将“萨德”系统搬运到韩国境内的可能性,韩民求表示,美方没有确定这样的方针。有分析认为,韩民求的上述答复婉转地表明了虽然韩国政府不会直接引进“萨德”系统,但现实上却可能容许驻韩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sup>④</sup>2015年3月1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闵庚旭(민경욱)在记者会上就美国是否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示,韩国政府坚持“3NO”(No Request, No Consultation, No Decision)立场,即:美国未向韩国提出任何请求,因此韩美没有就此协商,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sup>⑤</sup>直到2015年10月12日,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副部长)赵兑烈(조태열)在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时都还表示,定于本月16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的议题不包括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相关事宜。<sup>⑥</sup>可见,韩国在

① 《韩中防长商定尽早开通两国国防部间热线》,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2月4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204002400881>。

② United State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Briefing by Rear Adm. Kirby in the Pentagon Briefing Room,” February 10, 2015, <https://dod.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607010/department-of-defense-press-briefing-by-rear-adm-kirby-in-the-pentagon-briefing/>。

③ 《韩防长:韩方需对“萨德”系统持模棱两可态度》,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2月11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211002500881>。

④ 《韩防长:韩政府无引进萨德系统计划》,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2月25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225002000881>。

⑤ 《韩青瓦台对公开讨论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事宜持消极立场》,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3月11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311001400881>。

⑥ 《韩外交部:韩美首脑会谈不会谈及“萨德”问题》,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10月12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1012001500881>。

这一阶段对于“萨德”入韩问题一直保持着既不明确表示反对，也不明确表示赞同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有助于美韩就“萨德”问题进行私下协商，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这一未决事宜干扰韩中关系的发展。

第二，逐步试探（2016年1月-2016年6月）。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了第4次核试验。2016年1月13日，朴槿惠在青瓦台发表“对国民谈话”并举行新年记者会时表示，鉴于韩国与中国就朝核问题一直保持紧密沟通，坚信中国政府不会任由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她同时表示，将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出发，根据朝鲜的核武与导弹等威胁因素考虑美国“萨德”系统在韩国的部署事宜。<sup>①</sup> 2016年2月1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均（문상균）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若韩国能同时运作正在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和“萨德”系统，将有助于韩国的国家安全。他同时表示，据悉美国政府正在内部讨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事宜，但尚未向韩方提出就“萨德”系统进行协商的请求。<sup>②</sup> 而据韩国国防部消息，为讨论驻韩美军部署“萨德”系统事宜，韩美将于2016年2月成立联合工作组。<sup>③</sup> 可见，韩国在这一阶段对于“萨德”入韩问题已经从之前的暧昧态度逐渐转入对于中美两国就此问题的外交试探阶段。

其次，韩国通过推进多方面的对华合作以缓解中国对于美国联韩制华的担心。对于中韩两国来说，双方在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上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由此出发，韩国在暧昧推进“萨德”部署的同时，还在围绕经济议题和历史问题与中国寻求开展广泛合作。无疑，韩中两国无论是在经济议题的相互合作还是在历史问题上的彼此支持，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外溢效应。

其一，经济议题。首先，中国自2004年起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的

① 《朴槿惠望中国说到做到“不容朝核”》，韩联社中文网，2016年1月13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113004400881>。

② 远程地对空导弹是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Korea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KAMD）的核心，韩国军方计划截至2020年代初期完成对此导弹的自主研发。2015年3月，韩国国防部曾透露没有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计划，只计划构建利用远程地对空导弹（Long-range Surface-to-Air Missile, L-SAM）和中程地对空导弹（Middle-range Surface-to-Air Missile, M-SAM）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国防部：同时运作“萨德”和韩式反导系统有助于安全》，韩联社中文网，2016年2月1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201003600881>。

③ 《韩美2月将成立联合工作组讨论萨德入韩事宜》，韩联社中文网，<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210000500881>。

贸易伙伴。据韩国海关统计,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韩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为3273.4亿美元,占同时期韩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3.4%。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1955.2亿美元,占同时期韩国出口总额的25.4%;韩国自中国进口1318.2亿美元,占同时期韩国进口总额的21.0%。<sup>①</sup>其次,韩中经济外交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一方面,韩中贸易合作达成重大成果。2015年6月1日,历经十四轮的磋商谈判,中韩最终签订了两国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2015年12月20日,这一协定正式生效。另一方面,韩中金融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5年6月29日,韩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sup>②</sup>2015年12月25日,韩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sup>③</sup>“亚投行”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韩国对于中国金融外交建制努力的积极支持显然将超出单纯的经济影响,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再次,韩国对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欢迎、支持和对接的积极姿态。例如,2015年10月31日,中韩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欧亚倡议”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与韩国企划财政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17份合作文件。<sup>④</sup>

其二,历史问题。首先,韩中两国以抗日战争的共同记忆为纽带,互相支持对方的纪念活动。朴槿惠政府上台后,韩中两国围绕强化抗日战争的共同记忆展开了密切合作。2014年1月19日,中方不仅积极响应韩方提出树立安重根纪念碑的建议,而且还在哈尔滨火车站修建了更高规格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别贸易报告·2015年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2016年2月1日,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47547](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47547);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别贸易报告·2016年1-6月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2016年8月3日,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0172](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0172)。

②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网,2015年6月29日,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506/t20150629\\_1262372.html](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506/t20150629_1262372.html)。

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人民网,2015年12月25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5/1225/c1001-27978075.html>。

④ 《李克强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日,第1版。

安重根烈士纪念馆。<sup>①</sup> 2015年9月3日,朴槿惠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观看了阅兵式,同时获得来自中国方面的超规格礼遇。<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她也是美国亚太盟友中唯一出席该活动的国家元首。其次,韩国通过挖掘、移交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对华释放政治友好的善意信号。2013年12月5日和2014年1月22日,中韩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经过两次工作磋商,就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的基本事宜和重要事项达成共识,并于2014年起开始由韩方分批向中方移交志愿军烈士遗骸。<sup>③</sup>

如上所述,诚然韩国竭力寻求和推进对美和对华两相交好,但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韩国的两端外交有其内在限度。其中,由于安全议题具有比经济议题和历史议题的绝对优先性,因而美国或许可以接受韩国在持续巩固美韩同盟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和历史问题上同中国加强合作,但中国却显然无法接受韩国在大力发展韩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却与美国开展部署“萨德”系统等损害中国战略安全的反导合作。<sup>④</sup> 虽然韩国方面一直主张发展同中国和美国的并行友谊,<sup>⑤</sup> 但是韩国却始终无法建立起韩中美之间的三边磋商机制,<sup>⑥</sup> 遑论促进中美在对

① 《安重根烈士纪念馆在哈开馆》,载《光明日报》2014年1月20日,第10版。

② 《排除美日压力参加北京阅兵朴槿惠获中国超规格礼遇》,联合早报网,2015年9月3日,<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150903-522034>。

③ 《民政部谈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中国政府网,2014年4月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4/04/content\\_2653608.htm](http://www.gov.cn/xinwen/2014-04/04/content_2653608.htm)。截至2020年9月,韩方分七批共计向中方移交烈士遗骸716具。《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在韩国举行》,新华网,2020年9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7/c\\_1126547087.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7/c_1126547087.htm)。

④ 与之相应,从韩国的角度来说,纵然在经济议题和历史议题上与中国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以及合作,但当其面临安全赤字时(尤其是因朝鲜核导问题),韩国对于美国的安全依赖却无疑是压倒其对中国其他需求的。

⑤ 例如,新任韩国驻华大使金章洙(김장수)2015年3月31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韩国在中美两国间的外交政策方向,应同时加强与中美两国的沟通,力求在同中美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有利于韩国的“协同效应”。《韩国新任驻华大使:韩中关系尚有潜力可发掘》,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3月31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331001700881>。又如,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2015年6月19日在出席国会质询政府有关政治、外交、安全工作会议时表示,政府将在坚定韩美同盟的基础上一如既往地发展韩中关系,韩美、韩中关系不是“零和博弈”。《韩外长:韩美和韩中关系不是“零和博弈”》,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6月19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619001200881>。

⑥ 朴槿惠政府曾于2013年7月首次举办韩中美“一轨半”战略对话,但中美两国均未派出高级别代表。孙茹:《试析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第35页。

韩外交上达成战略默契和基本共识。因此,这一时期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只是借助自身相对凸显的战略价值和中美两国的战略争取而两面渔利,本质上并没有妥善处理 and 实质缓解中美在对韩外交上的内在冲突和战略交锋。

首先,美国虽然并未明确反对韩中接近,但仍要求韩国在重要议题上与其保持一致。2015年10月16日,朴槿惠同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了正式会谈。在共同会见记者时,奥巴马表示,韩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与韩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不相斥……我们对朴槿惠总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中国没有遵守国际规范时,韩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sup>①</sup>此外,美国还曾私下游说韩国等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sup>②</sup>

其次,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向韩方表示了对于美国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始终坚决反对的立场(如表3所示),并将这一问题置于战略安全的框架下进行审视。<sup>③</sup>虽然从美国协防亚太盟国的行动层面来讲,“萨德”系统在其可以提供的装备系统中无论是从效费比还是在战术针对性都是最为合适的。<sup>④</sup>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萨德”系统的在韩部署却是难以接受的:其一,中国认为这一反导系统超出了韩国自身预警和防卫的需要;<sup>⑤</sup>其二,中国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AN/TPY-2, Army Navy/Transportable Radar Surveillance Model 2)在末端部署模式下将增强美国对中国战略导弹的日常观测和战时预警能力而对中国造成战略抵消,进而损

---

① 《奥巴马:美国希望与韩中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10月17日,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1017000800881>。

② Jane Perlez, “U.S. Opposing China’s Answer to Worl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10/10/world/asia/chinas-plan-for-regional-development-bank-runs-into-us-opposition.html>.

③ 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中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和战略安全环境,反对以核问题为借口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开拓之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4页。

④ 祁昊天:《“萨德”入韩与美国亚太反导布局的战术与战略考量》,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7期,第18-19页。

⑤ 例如,李彬就指出,韩国部署绿松级别的雷达可以在不削弱韩国应付朝鲜导弹威胁的能力的同时,大幅减轻中国对于美韩反导合作的担心。Li Bi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AAD Deployment in the ROK,” Kyunghyang Daily, August 3, 2016, 清华一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官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fa=64279>。

害中国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能力；<sup>①</sup>其三，中国视“萨德”系统的在韩部署为美国在亚太及全球反导布局的重要一环，并认为其所构建的这一反导体系将会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sup>②</sup>

表 3：中国向韩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  
(2015年2月-2016年6月)

时间	地点	内容
2015年2月4日	韩国首尔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中韩防长会谈期间就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的可能性表示忧虑，并阐明了对此问题的反对立场。 <sup>③</sup>
2015年3月16日	韩国首尔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同韩国外交部次官补(部长助理)李京秀(이경수)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刘建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事宜呼吁韩方重视中方关切。 <sup>④</sup>

① “萨德”系统的雷达为X波段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末端部署模式下，可提供探测、监视、跟踪弹道导弹与杀伤评估，具备识别弹头、碎片和假目标的能力，为“萨德”系统的火控雷达。在前沿部署模式下，可独立对处于助推段飞行的弹道导弹进行预警探测，也可在预警卫星实施助推段预警后，对来袭导弹进行接力预警探测。根据吴日强的测算，“萨德”系统的雷达有较强的探测中国战略导弹的能力。如果指向中国，该雷达能够看到所有从中国沿海发射、打击美国本土的潜射导弹；能够看到从中国南部和中部发射、打击美国中部和西部的洲际导弹；还能在和平时期监测中国从渤海发射的潜射导弹飞行试验。在特定情况下，“萨德”系统的雷达还有可能看到中国导弹在发动机关机后释放弹头和诱饵的过程。另据王世涛和邢晓莉的仿真分析，“萨德”系统在韩部署后，在预警探测能力方面，将对第一岛链内中国东部沿海海域发射的弹道导弹突防构成严重的预警探测威胁，而对第一岛链内中国南部沿海海域发射的弹道导弹的突防形势影响不大；在拦截能力方面，尚不具备拦截第一岛链内中国沿海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但增程型“萨德”系统理论上可能将具备对远程导弹的拦截能力和有限的对洲际导弹的拦截能力，从而对中国沿海海域发射的弹道导弹突防构成一定的潜在威胁；在飞行试验电子防御方面，则将大大提高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识别能力，并对中国构成较之于电子侦察飞机和观察船更为严重的电子防御威胁。吴日强：《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47-48页；王世涛、邢晓莉：《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对中国沿海弹道导弹影响浅析》，载《飞航导弹》2016年第9期，第41-45页。

② 刘冲：《美国酝酿在韩部署“萨德”系统问题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16-22页。

③ 《韩中防长商定尽早开通两国国防部间热线》，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2月4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204002400881>。

④ 《中国外长助理刘建超：望韩方在“萨德”问题上重视中方关切》，韩联社中文网，2015年3月16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50316001500881>。

续上表

2016年2月23日	韩国 首尔	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在会见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代表金钟仁(김종인)时表示,中国一直对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问题持强烈的反对立场。他强调,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将对中国的安全利益造成很大影响,并会带来恶性循环,打破地区战略均衡,导致冷战式对决和军备竞赛,使紧张局势和不安进一步升级。 <sup>①</sup>
2016年3月31日	美国 华盛顿	朴槿惠同习近平在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青瓦台方面表示,朴槿惠和习近平就驻韩美军部署“萨德”系统进行了讨论,但没有透露两国领导人对话的细节。有分析认为,朴槿惠可能坚持韩方在该问题上的原有立场,即要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研究该问题,且“萨德”系统只用于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相反,习近平可能明确重申了中方坚决反对美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原有立场。 <sup>②</sup>
2016年6月4日	新加坡	韩民求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举行了双边会谈,中方向韩方提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意见。 <sup>③</sup>
2016年6月29日	中国 北京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황교안)。习近平表示,希望韩方重视中方的合理安全关切,慎重妥善处理美国计划在韩部署“萨德”系统问题。 <sup>④</sup>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报道整理。

对此,赵通认为,美韩选择使用“萨德”系统与“爱国者”系统高低搭配的方式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导弹能力虽然在技术层面有其合理性,同时“萨德”系统损害的主要是中国短程和中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其无论是在和平时通过观测所做的技术积累,还是在战争时期通过探测所提高的拦截效率,对于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威胁都相对有限,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在前者所面临的技术难度以及对于后者还有更优的预警系统。但是即便如此,在中美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的大背景下,中国对于美国在反导问题上的战略疑虑使得中国不得不按照最坏的情形去设想美国的战略意

① 《中国驻韩大使:中韩关系或因萨德问题而瞬间遭破坏》,环球网,2016年2月24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U3L1>。

② 《韩青瓦台:韩中领导人就萨德问题阐述各自立场》,韩联社中文网,2016年4月1日,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401003800881>。

③ 《韩防长会晤中国国防高官对萨德相互阐明立场》,韩联社中文网,2016年6月4日,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604001200881>。

④ 《习近平会见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2016年6月30日, [http://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yzs\\_673193/xwlb\\_673195/t1376522.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yzs_673193/xwlb_673195/t1376522.shtml)。

图和未来的政策发展，<sup>①</sup>而这恰恰是“萨德”问题的症结所在。<sup>②</sup>

由此不难看出，中美两国在对韩外交上的交锋和冲突并未随着韩国的两面渔利而有所缓解或得以解决；恰恰相反，这为下一阶段韩国在中美间两端外交陷入害人害己的困局埋下了伏笔。

### （三）害人害己的漩涡（2016年6月-2016年9月）

2016年6月3日，韩国防长韩民求在新加坡出席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Asia Security Summit）期间对媒体表示，在驻韩美军部署“萨德”系统的问题上，韩美两国的立场毫无分歧，<sup>③</sup>这被外界解读为“萨德”系统入韩已成定局。2016年7月8日，韩美两国正式对外宣布，从韩美同盟层面出发，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一套“萨德”系统。中国外交部旋即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sup>④</sup>由此，中美围绕“萨德”入韩的矛盾冲突正式明朗化。

首先，中美围绕“萨德”入韩的战略矛盾已经难以调和。在中美战略竞争与战略互疑的大背景下，中国无疑已经从战略安全角度对“萨德”在韩部署进行考量。期间，虽然韩国曾呼吁韩中美三国建设性地通盘商讨“萨德”入韩问题，<sup>⑤</sup>但是三国并未得以就此建立共同的沟通渠道和磋商机制。具体来说，关于“萨德”在韩部署，中国一方面加强了对美反制，另一方面则在全球层面通过深化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而强化了对于美国的战略制衡。2016年8月3日，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疑似“芦洞”导弹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在发射后不久爆炸，另外一枚则在飞行大约1000公里后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这一问题的紧急

① 王缉思和李侃如（Ken Lieberthal）将战略互疑定义为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他们把中美之间不断加深的战略互疑概括为三个基本来源：（1）两个政体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2）对于对方国家的决策过程、政府与其他实体的关系理解和鉴别不够；（3）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41页。

② 赵通：《中美韩关于“萨德”的认知分歧、根源与解决思路》，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309-317页。

③ 《韩防长说在“萨德”问题上韩美立场一致》，韩联社中文网，2016年6月3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603005000881>。

④ 《外交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16年7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78537.shtml>。

⑤ 《朴槿惠向习近平表态：“萨德”不会侵犯别国安全利益》，韩联社中文网，2016年9月5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905002400881>。

会议中，美国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举动，对导弹落入日本附近海域表示尤为关切，并要求安理会对朝鲜立即予以强硬回应。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表示，不应采取任何可能激化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举措。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则强调，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纯属自卫”，是对朝鲜发展军力的回应。当天，安理会未能就谴责朝鲜发射导弹的声明达成一致。之后，中方在第二次的闭门磋商中提出安理会的声明应增加如下内容：各相关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挑衅彼此和导致紧张升级的行动，不应以应对朝鲜核及导弹威胁为借口在东北亚部署任何新的反导据点。最终，安理会再次未能就此问题达成一致。<sup>①</sup> 2016年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其中，中俄明确表示，强烈反对域外势力在东北亚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反对以应对朝鲜核导计划为借口，在东北亚地区部署作为美国全球反导系统太平洋地区组成部分的新的反导据点。<sup>②</sup>

其次，韩国就“萨德”系统的部署问题在中美之间陷入进退两难。其一，青瓦台对于部署“萨德”系统所进行的解释和辩护并未被北京接受。2016年7月11日，朴槿惠在青瓦台主持召开首席秘书会议时表示，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针对除朝鲜外的任何第三国，不损害也没有理由损害第三国的安全利益。<sup>③</sup> 但是，诸如此类的表态并未能扭转中国和俄罗斯对此问题所始终坚持的反对立场。<sup>④</sup> 其二，韩国难以在中美

---

① “UN Fails to Condemn North Korea for Missile Test After China Draws Link to Thaad,” The Strait Times, August 10, 2016,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un-fails-to-condemn-north-korea-after-china-draws-link-to-thaad>.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新华网，2016年6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6/c\\_1119111908.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6/c_1119111908.htm)；《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新华网，2016年6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6/c\\_1119111895.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6/c_1119111895.htm)。

③ 《朴槿惠强调“萨德”不针对第三国》，韩联社中文网，2016年7月11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60711002400881>。

④ 即理解韩方有合理的国防需要，但不理解、也不接受做出超出朝鲜半岛实际防御需要的部署。《王毅：部署“萨德”系统超出实际防御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16年3月11日，<http://www.mfa.gov.cn/web/zyxw/t1347212.shtml>。

之间两全其美。对于“萨德”系统入韩，美方要求韩国按照美韩协议按计划如期部署，而中方则要求韩国尊重中方战略利益、重视中方安全关切停止部署。由此，韩方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进退失宜的两难局面：顾及韩中战略伙伴关系，就需要中止部署“萨德”系统，而这却会得罪美国；顾及韩美同盟，就需要继续部署“萨德”系统，但这则会开罪中国。

#### （四）自作自受的落幕（2016年9月-2017年5月）

随着美韩正式宣布“萨德”系统将在韩部署，中美韩三国已经就此问题陷入了政治漩涡。但是，考虑到中美关系较之各自与韩关系的战略性，中美两国开始将双方围绕“萨德”系统入韩的分歧和矛盾转化到各自的对韩外交中，从而导致韩国在事实上充当了中美两国在反导问题上紧张关系的“减压阀”。

首先，中美两国都避免“萨德”问题主导双边关系的政治议程。一方面，美国无意为韩国分担来自中国“反萨”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因“萨德”问题而在对美外交中投注过多的战略精力。2016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与前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晤。期间，中方虽然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并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战略安全利益，但同时也强调中美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认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sup>①</sup>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韩美两国防长、外长于2017年2月、3月相继举行会谈，重申将如期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对于“萨德”部署的反制措施，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提议美韩共同向中方澄清“萨德”系统只针对朝鲜不针对中国；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表示，中方采取的经济报复措施不合适，美方敦促中方保持克制。<sup>②</sup> 但是，蒂勒森在随后的访华过程中并未公开谈及“萨德”问题，还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①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华网，2016年9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534.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534.htm)。

② 《美防长称“萨德”对朝不对华韩美防长商定为军演加码》，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2月3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203004500881>；《美国务卿宣告对朝战略忍耐已尽促华停止“反萨”》，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3月17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317007200881>。

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sup>①</sup>而这恰恰是中方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相应地，中国方面虽然向美方就“萨德”问题表明了自身立场，但同时也主张双方应该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有关问题，并强调保持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sup>②</sup>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会晤期间，虽然中方重申反对美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但是比起建立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中美经贸问题等更为丰富和实质性的议程，“萨德”问题在此次会晤中显然仅仅占据极为有限的篇幅。<sup>③</sup>虽然会后特朗普与黄教安互通电话，介绍美中元首会谈的成功举行，并表示美方已向中方表达了有关“萨德”入韩的立场。<sup>④</sup>但是，比起韩国所承受的来自中国方面的直接压力，这种口头支持不过只是某种无补于事的政治安慰。

其次，韩国仍然深陷在中美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2016年10月24日，韩国爆出崔顺实（최순실）涉嫌干政的“亲信门”事件。对此，朴槿惠三次发表对国民谈话表示道歉。2016年12月9日下午7时零3分，身陷“亲信门”风波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接到国会送来的弹劾决议并被即刻暂停行使总统权限，而由时任国务总理黄教安代理总统一职。<sup>⑤</sup>之后，韩国关于“萨德”问题继续受到来自中美两国的不同压力。一方面，韩国无力松动来自中国官方坚决的反对立场以及缓和来自中国民间强烈的抵制情绪。例如，针对美国在韩部署的“萨德”系统的第一批装备于2017年3月6日晚抵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回应。<sup>⑥</sup>另据韩国

①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新华网，2017年3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19/c\\_112065393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19/c_1120653939.htm)。

② 《蒂勒森与王毅共见记者：将为两国高层会晤铺路》，联合早报网，2017年3月18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170318-737596>。

③ 关于此次会晤的具体内容，参见《王毅介绍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17年4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52259.shtml>。

④ 《特朗普和韩代总统通话：美中会谈时向中方就“萨德”表立场》，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4月8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0408000300881?section=search>。

⑤ 2017年3月10日，朴槿惠被韩国宪法法院正式罢免，黄教安因此继续担任代理总统。

⑥ 中方强调，我们坚决反对美韩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我们再次强烈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相关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2017年3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官网，2017年3月7日，<http://ipc.fmprc.gov.cn/chn/fyrth/t1443750.htm>。

现代经济研究院 (Hyundai Research Institute, HRI) 估算, 韩国在 2017 年因中国“反萨”而承受的损失可能达到 8.5 万亿韩元, 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5%。<sup>①</sup> 另一方面, 韩国也无力扭转美国对此问题的坚决态度以及既定的部署进程。2016 年 12 月 18 日, 黄教安在接受韩联社电话采访时表示, 政府主要政策的基调不会出现变化, 将继续贯彻现有政策。他就“萨德”系统入韩问题表示, 韩美经艰难历程达成协议, 这并非韩国单方面做出的外交政策, 因此很难轻易改变立场。<sup>②</sup> 2017 年 3 月 7 日, 黄教安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就朝鲜 6 日试射弹道导弹一事进行深入探讨。次日, 黄教安出席在忠清南道鸡龙台举行的军官联合授衔仪式, 并在致辞中强调, 应如期推进“萨德”入韩进程以应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sup>③</sup> 2017 年 4 月 17 日, 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 (Mike Pence) 与韩国代总统黄教安在位于首尔三清洞的韩国总理官邸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媒体声明。声明指出, 为了韩美同盟关系, 将持续推进在韩部署“萨德”系统。<sup>④</sup> 此外, 在美国的强力“撮合”下, 韩国还同日本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签署了刺激中国神经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sup>⑤</sup> 并遭致中国方面的严肃批评。<sup>⑥</sup> 可以说, 韩国在这一时期几

① Yonhap News Agency, “S. Korea, China to be affected by THAAD Fallout: Think Tank,” May 3, 2017, <https://cn.yna.co.kr/view/AEN20170503002700320>.

② 《韩代总统坚持涉“萨德”和韩日慰安妇协议现有政策》, 韩联社中文网, 2016 年 12 月 18 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1218000200881?section=search>。

③ 《韩代总统强调如期推进“萨德”入韩进程应对朝核威胁》, 韩联社中文网, 2017 年 3 月 8 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0308004000881?section=search>。

④ 《美副总统称为了韩美同盟将如期推进“萨德”入韩》, 韩联社中文网, 2017 年 4 月 17 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0417005500881?section=search>。

⑤ 《韩日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新华网, 2016 年 11 月 2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4/c\\_12937597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4/c_129375975.htm)。2019 年 8 月 22 日, 韩国政府宣布不再与日本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国决定不再与日本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日方提出抗议》, 新华网, 2019 年 8 月 2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8/23/c\\_112491001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8/23/c_1124910015.htm)。2019 年 11 月 22 日, 韩国政府决定暂停先前向日方发出的终止韩日军情协定通知的效力, 前提是韩国政府随时可以终止军情协定的效力。《韩国政府推迟终止韩日军情协定》, 新华网, 2019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11/23/c\\_1210365880.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11/23/c_1210365880.htm)。

⑥ 针对日韩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有关国家固守冷战思维, 加强情报军事合作, 将加剧半岛对立对抗, 给东亚地区增添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外交部回应日韩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新华网, 2016 年 11 月 2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11/24/c\\_129376355.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11/24/c_129376355.htm)。

乎同时承受着来自中美两国的安全关切和外交压力。

由此可见，虽然中美两国在反导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是顾及中美关系的大局，两国不约而同地将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交锋逐渐转化为各自对于“萨德”入韩而施于韩国的政治压力。

#### （五）寻求改善的努力（2017年5月-2017年11月）

2017年5月10日，文在寅（문재인）宣誓就任第19届韩国总统，标志着文在寅政府的正式上台。对此，韩国方面希望借此契机改善因“萨德”问题而急速转冷的韩中关系。同时，中国方面也期待韩国政府能在文在寅执政后改变其对“萨德”在韩部署的态度。因此，韩中两国逐渐恢复了之前中断的高层交流。

具体来说，文在寅政府主要通过循次渐进的三个方面以寻求缓解因部署“萨德”系统而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所处的两难局面，力图实现韩国就此问题在韩美同盟与韩中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身份兼容。

第一，和前政府进行切割，与其立场保持距离。在竞选总统初期，传统左翼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主张，是否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应由下一届政府做决定且该问题须获得国会批准。之后，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选情需要，文在寅将这一立场调整为，若朝鲜继续用核武发起挑衅并发展核武力量，则有可能促使韩方执意部署“萨德”系统；若朝鲜封存核武重返谈判桌，则韩方可暂缓部署“萨德”系统；若朝鲜完全废除核武器，则不必在韩部署“萨德”系统。<sup>①</sup>2017年5月12日，韩国国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沈载权（심재권）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萨德”对策特别委员会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作为朴槿惠政府的代表性积弊，部署“萨德”是非常草率的决定。在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下台后，代总统黄教安及其政府仍然还在对此强行推进。他强调，新政府已经成立，以国防部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应该立刻停止非法部署“萨德”系统。<sup>②</sup>之后，文在寅政府还就4辆“萨德”反导拦截弹发射车暗中入韩事件进行彻查，并称此事系国防部蓄意漏报。<sup>③</sup>

① 《韩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安哲秀改口挺“萨德”迎合中立选民》，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4月11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411003400881>。

② 《韩执政党宣布“萨德”“不合法”要求立刻停止部署》，联合早报网，2017年5月13日，<http://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170513-759504>。

③ 《韩青瓦台称国防部蓄意漏报4辆萨德发射车入境》，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5月31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531003000881>。

不难看出，文在寅政府从竞选到执政一直都在就“萨德”入韩问题同朴槿惠前政府进行切割，并与其在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第二，主张遵循正当程序，要求美方放缓部署。为了缓解韩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同时承受的来自中美两国的压力，文在寅政府要求“萨德”部署必须遵守“环评”等韩国国内的法定程序之后才能继续进行，而在事实上延迟了“萨德”系统在韩的部署进程。文在寅提出，“萨德”系统的部署流程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全部提前，不符合当初的协议。对此，不仅朴槿惠政府有失误，美国也要负一定的责任。<sup>①</sup>韩国外长康京和(강경斗)在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时也表示，在部署“萨德”系统的问题上，韩国国内有民主正当性和程序透明性方面的需求。对此，蒂勒森表示，尊重韩国国内的民主程序。<sup>②</sup>由此，韩国借美式民主制度的共同纽带<sup>③</sup>获得了美方对于延缓部署事宜的理解和接受，进而也得以就此向中方要求减轻“反萨”压力。

第三，对华做出政治承诺，并达成阶段性处理共识。围绕韩中两国在“萨德”系统在韩部署问题上的矛盾对立，文在寅政府寻求通过与中国在彼此沟通的基础上达成相互谅解。文在寅强调，韩中两国需要以易地思之的换位思考来尊重和照顾彼此的重大关切。例如，文在寅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就表示，韩国和中国在“萨德”问题上有各自的立场，如果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对方的立场。”<sup>④</sup>具

① 《韩向中美释放信号斡旋萨德首脑外交两手抓》，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6月23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623003000881>。

② 《韩国外长康京和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6月23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623000100881>。

③ 文在寅在2017年6月的访美之行中曾直言不讳地表示，韩国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从美国“移植”来的，美国应为韩国的成功感到高兴。《文在寅对特朗普“铁腕外交”表示认同》，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6月30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630003400881>。

④ 文在寅表示，韩国决定部署“萨德”是在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和试射导弹的情况下，是为应对朝鲜的挑衅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韩国引进“萨德”纯粹出于防御目的，没有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的意图。他还表示，中方因“萨德”雷达的性能而担忧“萨德”会有损中国的安全利益，对此韩方也有必要换位思考。今后韩国将格外注意不把“萨德”用于防御朝鲜核武和导弹以外的地方，不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对此美国也多次做出承诺。《文在寅接受中国央视专访》，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12月12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212000700881>。

体来说,自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中韩两国元首和外长相继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联合国大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等多个国际场合进行了会谈,并就“萨德”问题交换了看法。<sup>①</sup>期间,虽然中韩双方对“萨德”入韩依然坚持各自立场,但双方均表示愿尽快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以改善双边关系。之后,为了弥合韩中两国就“萨德”系统在韩部署所产生的战略分歧,文在寅政府在继续强调这一行为的防御和自卫性质的同时,也对中方的战略关切作出了相应回应。2017年10月30日,韩国外长康京和在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外交部国政监查时表示,政府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反导体系、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三国军事同盟。<sup>②</sup>次日,中韩两国外交部同时在官网发布就双边关系的沟通结果,包括在韩部署的“萨德”系统不针对第三国(即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以及有关构建反导体系、追加部署“萨德”系统、韩美日军事合作等方面的内容。<sup>③</sup>对此,中国外长王毅在同韩国外长康京和于2017年11月22日举行的会谈上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韩关系经历波折,不久前双方通过发表共同新闻稿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一些共识。<sup>④</sup>至此,在韩国对华做出“三不”承诺(即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发展韩美日军事同盟)以及无意损害中方安全利益表态的基础上,<sup>⑤</sup>两国就在当前时期共同管控双方围绕“萨德”问题所产生的分歧最终达成共识。<sup>⑥</sup>

①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新华网,2017年7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06/c\\_112127675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06/c_1121276750.htm);《王毅会见韩国外长康京和》,新华网,2017年8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8/07/c\\_112143936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8/07/c_1121439365.htm);《王毅会见韩国外长康京和》,新华网,2017年9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1/c\\_1121701936.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21/c_1121701936.htm);《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11月1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1/11/c\\_1121941083.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1/11/c_1121941083.htm)。

② 《韩外长: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10月30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030002000881>。

③ 《中韩双方就中韩关系等进行沟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17年10月31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506044.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506044.shtml)。

④ 《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3日,第3版。

⑤ 《韩中外长今在京会晤》,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11月22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22005500881>。

⑥ 2017年11月27日,康京和在出席韩国国会外委会全会答议员问时强调,“阶段性”处理不是今后分阶段(step by step)处理,而是在当前情况下,在现阶段(at the current state)妥善管控分歧。《韩外长否认中方要求涉萨“三不”》,韩联社中文网,2017年11月27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27005500881>。

回顾韩国于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可以发现，朴槿惠政府所期望的三方共赢的两端外交，由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特别是两国在“萨德”系统在韩部署问题上的安全对立，不过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幻象；之后，虽然韩国曾借中美对其的两相争取而一度在两国之间左右逢源，但这种战略渔利却随着中美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矛盾分歧日益不可调和而难以为继；最终，中美韩三国由此陷入两两负和的政治漩涡；然而，由于考虑到中美双边关系较之于各自对韩关系的战略性，中美两国事实上将在“萨德”问题上的战略交锋逐渐转化为各自之于韩国方面的政治压力。面对这一进退失宜的身份两难，文在寅政府通过政治切割、放缓部署和有限合作三个循次渐进的步骤，技术性相对缓解了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以及对韩国现任政府的政治压力，从而使韩国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勉强回到一种消极且脆弱的两相兼顾和三方“共赢”。

#### 四、结论

两端外交是国际关系中三方政治的典型形态。为了理解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本文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两端外交的理论探讨以及两端外交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实践；接着，根据两端外交的内部效果和外部效应，本文将两端外交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并阐释了每种类型两端外交的行为逻辑；最后，本文以韩国于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在中美之间的两端外交为案例，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为了有效应对两端外交中的身份两难，本文认为至少应当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及时止盈与固本。在任何类型的关系互动中，任何一方都应为相互之间的关系发展留有空间和保有余地。特别地，在三方互动中，由于己方与两端其中一方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与两端另一方的关系造成传导作用和连锁影响（相长或相消），因而更应注意在与两端对象的交往过程中及时止盈与固本，以避免短多长空和实现持盈保泰。

首先，及时止盈在于实现收益的可持续而非获利的最大化。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在己方与两端对象的互动过程中，虽然存在通过与其中一方的关系跃进而带来高额获利的可能情况。但是，受制于两端对象中另一

方的隐性约束（例如难以实现观众隔离），<sup>①</sup>这种高额获利往往因为己方行为存在弹性极限而难以持续。与此同时，原先一方往往也难以接受这种假性热络之后的真实回落，毕竟比起“退一进一”，人们显然更不愿意面对“进一退一”。因此，行为体在开展两端外交的过程中，应及时止盈以保证稳定收益，避免由于关系倒回之后，两端一方介怀现在“退一”而非顾念原先“进一”，以及另外一方介怀原先“进一”而非顾念现在“退一”所导致两端对象同果不同因的政治夹击。

其次，及时固本在于夯实巩固关系基础以保证身份的稳定性。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己方与两端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并存“被争取”和“被冷待”的双重可能。对于这种冷热交替、损益参半的情况，两端外交的开展方需要在“被争取”时夯实和巩固关系基础，通过借此建立丰富有效的共有纽带来抵消潜在“被冷待”情况下可能面临的代价和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两端外交的实践者与其中一端夯实巩固彼此的政治友谊不应以针对另一端为前提或以牺牲自身与另一端的战略关系为代价，而是要以双边层面的关系深化和拓展为基础。由此，两端外交的开展方才得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自身既有身份的稳定性。

第二，扮演积极第三方。在一种需要长久维持的三方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持续利用其他两方的相互对立而永续获益。就此而言，行为体若要在两端外交的开展过程中确保实现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左右逢源，其两端外交战略的关键不止在于在两端对象之间找到以及找准关系均衡点，更在于有效塑造二者之间相对缓和的关系结构，而这就需要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在与两端对象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积极第三方。

首先，扮演积极第三方意味着要在两端对象之间发挥正面作用。由于两端对象之间的相互对立往往导致双方不仅难以就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寻求沟通和展开对话，而且还会干扰和阻滞既有和潜在的相互合作。对此，行为体在两端外交中扮演积极第三方的意义在于借助自身所发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缓和两端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一方面为缓解乃至化解双方之间的对抗冲突提供渠道和居间协调，另一方面则为两端对象之间的包容

---

<sup>①</sup> 通过隔离观众，表演者可以确保此时观看着他这种角色表演的观众一定不会是他在另一种舞台设置下表演另一种角色时的观众。[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合作制造机会和拓展空间。因此，行为体在两端外交中的积极第三方扮演兼具双重内涵：两端对象之间冲突的阻化剂与合作的催化剂。为了发挥这种正面作用，行为体在两端外交中要居间穿梭而非置身事外甚或隔岸观火，要扮演说和者而非挑唆者，要寻求三方共赢而非贪图己方渔利。

其次，扮演积极第三方同时隐含避免对于两端对象的自我牺牲。在两端对象之间扮演积极第三方的目的在于缓和两端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最终出现非此即彼、二择其一的排他局面。在此过程中，行为体在开展两端外交的过程中还应注意防止承受两端对象的矛盾转嫁。需要明确的是，扮演积极第三方是为了解决而非转接两端对象之间的矛盾。身为积极第三方，需要在两端外交的开展过程中付出一定成本，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等于行为体就要因此进行自我牺牲。显然，两端外交中的自我牺牲不仅将严重损害积极第三方的战略利益，也将从根本上败坏鼓励行为体在冲突双方之间扮演积极第三方的整体风向。进一步地，两端对象对于积极第三方的予取予求而非正面反馈更将变向刺激其利用两端对象之间的矛盾冲突险中渔利。据此，为了实现两端外交中的三方共赢，两端对象一方面要尊重和关切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对于“被牺牲”的顾虑和担心，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策应和激励积极第三方的角色扮演。

与几何原理中的三角稳定相反，社会互动中的三人关系并不那么稳定，这是由于行为体之间关系的“边长”和“夹角”往往因时而异、随势而动。<sup>①</sup>因此，国际关系中的身份两难始终是两端外交潜在的政治难题。对此，通过理解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我们得以认识两端外交的基本类型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据此，两端外交中的身份两难虽然无法最终完全消除，但却可以通过两端外交的开展方在两端对象之间做好及时止盈与固本和扮演积极第三方而予以缓解和预防，而这同时也为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中的三方关系处理提供了一种思路借鉴。

---

① 此外，两端外交除了涉及两端对象之外，往往还要考虑三方关系中的潜在第四方。例如，车维德(Victor D. Cha)就认为，在目前的半岛局势中，当中美关系趋缓时，韩国处于安全盈余(security surplus)，而朝鲜却面临安全赤字(security deficit)；反之，当中美关系趋紧时，韩国面临安全赤字，但朝鲜却处于安全盈余。Victor D. Cha,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3, No.4, 2020, pp. 525-530。就此而言，中美韩三方互动会显著影响朝鲜的安全感知及其实践，并反作用于中美韩三方关系。由此，我们对于两端外交的观察将从二维(三角形)变为三维(三棱锥)。

##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Function of Two-Sided Diplomacy**

**Liu Le**

**Abstract:** Identity dilemma refers to a predicament in which oneself feels difficult to take both sides into account in a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trilateral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ate carrying out the two-sided diplomacy may face such an identity dilemma. In order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function of two-sided diplomac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ects, the two-sided diplomac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basic types. Among them, if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other two sides has not improved or eased, the two-sided diplomacy is destined to be in a dilemma. In order to avoid this situation, the state carrying out the two-sided diplomacy needs to overcome the short-sightedness. Instead of making 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other sides, it should play a positive third-party rol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Identity dilemma; Two-sided diplomacy; South Korea

**Author:** Liu Le,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The choice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Korean War: Basing on the Entangling Alliances theory**

**Shen Wenke**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ays for small states to influence the big